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王尧 我警惕自己，也警惕“我们”的无病呻吟

近年来，有几位学者“转行”小说创作，成果颇丰。苏州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王尧是其中之一，他的本行是文学批评。《重读汪曾祺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2020年王尧推出长篇小说《民谣》，受到关注。他说自己有三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做文学研究，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散文，诗歌则是在手机上随手记录。他坦言，“我只想做几个写作者”，并且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纸上的知识分子”是王尧一本随笔集的题名，亦是贯穿他写作的重要内核之一。2021年至今，王尧已陆续出版了散文集《时代与肖像》《日常的弦歌》《我们的故事是什么》，这些作品皆从日常生活毛茸茸的细节切入，为知识分子画像。在娓娓道来的散文笔调中，诸多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历史细节重新向我们走来。

应该期待怎样的文学？如何评价当下的小说创作？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王尧——



王尧

A 历史的肌理在日常生活中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您先后推出多部散文集，这些散文都是从小的切口去呈现大的历史。为何选用散文这样一种轻的文体来进入重大的历史？

王尧：这样的写法与我的历史叙事的观念和方法有关，也与我对材料的分析有关。《时代与肖像》写乡村人物，这些人物和相关的故事只是大历史中的小插曲，我在谈《民谣》时也说过这类话题。《日常的弦歌》和《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涉及很多重要文化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大历史，但他们的精神是在日常生活中生长的。不被日常生活销蚀，反而挺拔崛起，这就是“人物”。历史的肌理在日常生活中。

羊城晚报：鲁迅的作品以及一代散文大师汪曾祺的作品对您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尧：我最早读到的现代作家文集是鲁迅的《朝花夕拾》，这本书从村上带到镇上，再到大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虽然已经有一套《鲁迅全集》。我经常翻这本书，在谈《时代与肖像》时，我说我想写

自己的一本《朝花夕拾》。回忆自己的写作，确实是从模仿鲁迅开始的。鲁迅的精神、语言、思想，是我不断的资源。我研究过汪曾祺，他的语言、调性对我也有很大影响。汪曾祺是当代作家中的“文章家”，谈过汪曾祺，才知道一个写作者能够写出自己的汉语才是重要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散文创作的现状如何？

王尧：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前，我主要是研究散文。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现在是散文的时代，不是诗的时代。现代散文在现代文学中是成熟比较早的文字，鲁迅说过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诗歌之上，但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小说成为文学秩序的中心文体，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散文的位置是边缘化的。

当下不能说没有好散文，但好散文确实不多，任何一个文学时代都是这样。散文其实是有难度的写作，它是这样一种文体——写作者的信仰、人格、襟怀、气息和他想说的话要融为一体。

B 没有深刻痛苦，就没有优秀知识分子

羊城晚报：在您的散文中，大量讲述了作家文人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故事。在跟他们对话的过程中，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王尧：我常常假想自己生活在他们当中，这时我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他们的崇高与卑微都会让我怦然心动。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他们的家国情怀天地泣鬼神。我以前对跨世纪没有特别的感受，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现自己也跨世纪了。20世纪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主动介入了时代大潮，在现代史的重要环节都留下了他们的呐喊和彷徨。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也好，文人作家也好，和他们相比，我们“猥琐”了。这可能避免了大起大落的悲剧，但又处于另一种悲剧之中。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理解和评价“八十年代文学”的？

王尧：“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文学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当代中国，八十年代作为年代的意义远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八十年代文学”，既是断裂，也是开始，它因此重要。“八十年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是被历史化或经典化处理了，这是一项未完成的学术任务。

羊城晚报：您还完成了一本学术专著《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新时期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是否是同一个概念？

王尧：你所说的命名问题，是一个涉及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作为学科的问题。“当代”是时间概念，还是历史概念，一直有争论。现在很难统一，在讨论“文革”后的历史转折时，“新时期”具有特定意义，但新时期不能无限期延伸下去。所以，后来出现“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概念，

C 要多研究些问题，少开些会议

这些概念都是暂时性的，也许“八十年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可能会使用下去。我们现在先在先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些概念，文学史是越写越薄的，也许很多年以后有些年代可以忽略不计。

羊城晚报：“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中，您提到杭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当下的文学生态中，会议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王尧：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学，文学制度是考察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文学会议是文学制度之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会议对推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现在的会议似乎成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但很多学术会议并不产生知识。这个现象的产生与大学科研方式和作家协会作品研讨方式有关。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议总是需要的，但现在确实泛滥了。我们要多研究些问题，少开些会议。

我相信，新教授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些坐在台下、经受过“学新闻有什么用”捶打的孩子，那一刻一定释然并安静了。他们并不一定得到了答案，但有了方向，在大学的高处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未来的4年，他们一定会经受同类问题的挑战，反复怀疑，专业课后的怀疑，实习后的怀疑，稿子被毙后的怀疑，就业打击后的怀疑，但第一课的召唤会在他们心中回响。

D 恢复学者写小说的传统

羊城晚报：除了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您也写小说。长篇小说《民谣》酝酿了20多年，是什么触动您写这本小说的？

王尧：我一直有作家梦想的，在大学几十年没有完全被学术体制改造掉。写小说，肯定与我青少年的记忆有关，走出村庄后的生活还需要消化沉淀。二十多年前，我写下了《民谣》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后来断断续续写，直到新冠疫情暴发那一年，才静下心来完成了这次马拉松式的写作。

我想在一个少年的视角中呈现大历史中的小插曲，也回溯自己思想和感情的最初来源。我从2001年开始，与林建法先生合作主办“小说家讲坛”，开始和莫言等作家接触，这也是我创作欲望再起的过

程。莫言、阎连科等小说家对我的影响是整体的，主要还不是小说技巧的影响。研究小说和写小说，现在是两个行当，这种差别便是长处和短处的分别。

羊城晚报：当下似乎很多学者都在尝试小说创作，从学者转变为作者，像您、张柠、吴亮等。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王尧：我不知道学者写小说能不能称为现象。在新文化传统里，既是学者又是作家、诗人的文化人太多了，只是后来越来越少了，这个传统断裂了。我希望能够恢复这一传统。学者写小说，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文学教育的现状。这就像很多著名作家到大学担任教授一样。

的文学教授，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倡导最终可能都是无效的，受某种倡导的写作似乎更容易失败。写作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世界文学，那些经典作家作品，他们永远是我们字里行间的灯光。我们读经典作家作品，就会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做文学史研究，也关注那些已经被我们遗忘的作品，教训和经验都是我们面对的遗产。

羊城晚报：接下来您有着怎样的创作计划？

王尧：我现在很想安静读书，找一个陌生的地方呼吸新鲜空气。创作和学术研究有些不同，很难具体计划。目前正在修改、打磨一部新长篇小说，也许明年能和读者见面，这是一部写1937年苏州沦陷后一个文人家庭命运的小说。我写小说没有功利，压力是不能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有散文专栏约稿，如果明年的学术研究工作能顺利完成，可能会考虑再写一篇散文专栏。

王尧：我做了几十年

E 受某种倡导的写作似乎更容易失败

羊城晚报：在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评委会会议上，您倡导新“小说革命”。为什么今天的小说需要一场新的革命？

王尧：那次会议我是即兴发言，但说的主要想法可能是长期酝酿的。作为批评家，我对当下甚至这么多年的小说创作总体是不满意的。我说“小说革命”，是用激烈的语言唤醒写作者的危机意识和艺术革新意识。我在会后将发言整理成一篇文章《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在文章中，我列举了一些问题，比如，小说家没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建构世界的能力，小说有故事但没有语言和思想，等等。现在可能还要加上一个问题：为获奖而写作的小说家太多了。“小说革命”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没有能力积蓄方向，解决我说的那些问题，就是“小说革命”的开始。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当下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文学，有哪些作家值得推崇和阅读？

王尧：我做了几十年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关于《野草》的一点感想

虽然《野草》的初版上印着“1927年7月”字样，但我以为，以鲁迅迟至10月才见到样书，《野草》真正的初版印成，应该在9月。这是一本只有2万字的小书，因为鲁迅当时人在广州，北新书局在北京编辑印制时，还出现了一个让鲁迅在上海看书时就很不高兴的错误：封面上的作者署名是“鲁迅先生”而非“鲁迅”。再加上《题辞》的删去，加入《野草》的版本仿佛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直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野草》一共已发行过十二版之多。这既是《野草》不断扩大影响的证明，也是版本不断有所变化的旁证。

不管怎么说，一本初版只印了千把册很快收回的小书，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不过是一粒不起眼的沙，然而近百年后再回首，《野草》的出版无疑是一件意义巨大的大事。从体量上看，《野草》很单薄，“根本不长，花叶不美”，然而，它的精髓却“吸取着，吸取水，吸取死人的血和肉”，无比复杂、深邃。阅读《野草》，仿佛置身于思想的迷宫，走不出，甚至也不愿走出。

【名著识小】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为啥观音那么“贫”？

观音这个形象，在大部分图像化的叙事里，都是正大仙容，大慈大悲的“地母”形象，其实《西游记》里，她是一位非常活泼，甚至有些贪嘴的女士。举个例子，取经团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困住，急待观音净瓶里的杨柳甘露去救难。但是这位观音大士，推三阻四，各种借口：菩萨坐定道：“悟空……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一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从来没听说过请救兵还要抵押品，而且观音你是“项目经理”，怎么不相信孙悟空这个小弟呢？果然行者摸遍了全身，“我身上这件棉布直裰，还是你老人家赐的。这条虎皮裙子，能值几个铜钱？这根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放慢脚步”的召唤

正值开学季，校长和院长向新生的致辞，和新生们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课，塑造着新人们对大学和专业的底层认知。众多开学致辞中，我最喜欢两篇，推荐给朋友，一是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教授的《放慢脚步，弥合裂缝》，一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明新教授的《新闻传播学的价值和底色》。

苏必德教授提到：希望你们能培养谨慎、有条理的行动习惯——放慢脚步，不仅为了放慢白驹过隙般的时间，也为反思听到的各种观点，准备好进入世界，弥合裂缝。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瞬间满足，仔细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当我们我们在社交网络看到一条推送，我们先得空洞的“点赞”，然后才读到的是与我们想法一致的评论，而不是真正正确的。互联网将人与人连接在一起，但它让我们失去了耐心——

说得多好啊，耶鲁校长不是学新闻的，但致辞中处处闪烁着新闻人的敏锐和对新媒体冲击的警惕性，这种媒介素养是跨专业、通识性的，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人应具备的底层逻辑。

张明新教授说：新闻传播专业的学习，需要静水深流般的从容与舒缓。人生的成长不是在匆忙中快速打靶，不是在竞争中互相消耗，而是一个如河水般流淌的自然过程。甚至有时候，过慢本身就是目的。希望各位不要将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闲散、放空和留白的时光，有时比紧张的学习更有价值。——这种让学生“放慢脚步”的召唤让人感动。

我想起卢梭在《爱弥尔》中所说，在使爱弥尔成为一名军人、教士或行政官员之前，他先要使他成为一个普通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声称，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商人、企业主或专家。因此，让教育使他们成为有能力、有理智的人，他们以后在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会满足他们自己。——站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考研辅导机构，他们会盯着找工作和饭碗，而大学的目的是“立德树人”，不是“饭碗票子”。大学和职业教育是给人的一生打底子，是用知识和思想底座撑起一个人的40年、50年、60年。如果站得足够高，你才会发现，大地其实是星空的一部分。一个校长或教授，他们的开学致辞如果每句话离不开“4年后的饭碗”，这不是大学，是技能培训机构。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微笑的葬礼

在西非加纳，饭后散步，远远地，听到了震天响的乐声，走近一看，有乐队在奏乐，勾心摄魂的音符疯狂地飞来飞去——有人说，非洲人的关节里蕴藏着旋律，血液里流动着节奏，这话一点儿也没错——只见在场的男男女女全都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摇头、晃脑、扭腰、摆臀、蹬足，两条柔软的手臂犹如不跳舞的人呢，围桌而坐，大吃大喝，高谈阔论，喝空了的啤酒瓶活泼地在桌底滚来滚去。

看到仁立一旁的我们，东主热诚地请我们坐下，还送来了两瓶啤酒。我好奇地问道：“你们是在办喜事吗？”他摇头答道：“不，我们在办丧事——我父亲昨天刚刚下葬。”我大吃一惊——父亲尸骨未寒，子孙居然狂舞狂饮，这是哪门子的逻辑？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他耐心解释道：“对于我们加纳人来说，办一场微笑的葬礼，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死亡对逝者而言，就象象征一段崭新旅程的开始。不论我们心里有多不舍得，都不能用眼泪来为他的新生铺路。近年来，加纳还盛行在下葬日亲人一边抬棺一边唱歌跳舞呢！这样做并非非礼，更非荒诞，而是祝福、祈愿；让逝者得以无牵无挂地上路，继续另一个世界的精彩。

加纳人对死亡这种豁达的信念，和鼓盆而歌的庄子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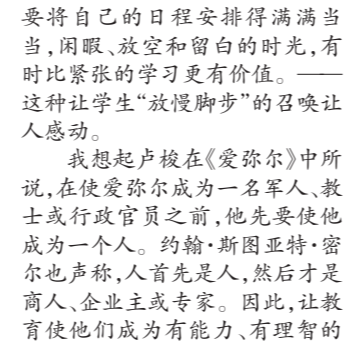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需要在观看前做一些背景准备才能及时理解其中知识“梗”的电影。但我几乎是带着一颗空荡荡的大脑进入影院的，除了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之外。三个小时后走出影院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影片的细节和对话，却反复回荡在脑海里。电影《奥本海默》根据美国普利策奖得主：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改编，原著曾获2005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这部电影的开局似乎是一个电影编剧示范——故事从中间开始，从一个关键人物和主要矛盾的交汇场景开始。电影用彩色镜头来展示奥本海默的视角，用黑白镜头来展示客观视角。

【随手拍】

童年时光

口图/文 施敏

8月，江苏海门东洲公园里，两个小孩在掰手腕，比比谁的臂力大，这是留存存在许多人脑海里的童年时光。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博萨德的照片

后，他是这一持久战的实地目击者，也是具有批判性的观察者。他也因此受到各方正义人士认可和尊重。在博萨德看似随和的外表后面，其实是那坚毅不拔的性格。战争期间，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辗转于不同的前线之间，以便进入各方权力的中心。国府的最高统帅、日方的将军、军阀，以及富有影响力的女性角色都成了他的摄影对象，并将之定格为永恒。混乱的大都市，偏远的乡村，都成了他镜头下的影像。历史总是不断地被发现。正是博萨德对战争的多元视角的报道，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一段历史。由于时代的原因，历史真相往往被遮蔽。在这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博萨德拍摄的照片展示了日军的残暴、废墟上中国普通百姓的无奈、李宗仁自信的微笑、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以及游击队员的日常生活。这些照片，是博萨德用他整个生命的投入换来的。

【名家识小】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为啥观音那么“贫”？

观音这个形象，在大部分图像化的叙事里，都是正大仙容，大慈大悲的“地母”形象，其实《西游记》里，她是一位非常活泼，甚至有些贪嘴的女士。举个例子，取经团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困住，急待观音净瓶里的杨柳甘露去救难。但是这位观音大士，推三阻四，各种借口：菩萨坐定道：“悟空……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一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从来没听说过请救兵还要抵押品，而且观音你是“项目经理”，怎么不相信孙悟空这个小弟呢？果然行者摸遍了全身，“我身上这件棉布直裰，还是你老人家赐的。这条虎皮裙子，能值几个铜钱？这根

铁棒，早晚却要护身。但只是头上这个箍儿，是个金的，却又被你弄了个方法儿长在我头上，取不下来”。你这不是为难俺老孙吗？

结果观音的方案是，要孙悟空脑后的一根救命毫毛！我们讲道理，这三根毫毛明明是观音送给孙悟空的，怎么能拿来抵押呢？孙猴子当然不肯。于是菩萨骂道：“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

整段话没有任何推动情节的作用，也没啥教育意义，更谈不上丰富人物个性，两人逗趣，逗贫，只为引出最后一句“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西游记》的故事以说书形式重现，这一段就是剧场里的一个小噱头，无关情节与结构，就是逗一下世，只为逗观众哈哈一笑。